

# 文 源

林義光著

中西書局

# 文源

林義光

著

中西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文源 / 林義光 著

上海 : 中西書局 2012.3

ISBN 978-7-5475-0348-5

I . ①文 … II . ②林 … III . ①漢字 — 古文字學

IV . ①H12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2)第013634號

林義光 著

封面題簽 劉少剛

責任編輯 賀寅 李碧妍

裝幀設計 王軼頃

出版發行 上海文藝出版(集團)有限公司([www.shwenyi.com](http://www.shwenyi.com))

中西書局 ([www.zxpress.com.cn](http://www.zxpress.com.cn))  
地址 上海市打浦路四四三號榮科大廈十七樓 (200001)

地經銷各地 新华书店

刷 上海市印刷七廠有限公司

本 六八〇×一〇九二毫米 十六開

張二十九 · 五

次 二〇一二年三月第一版 二〇一二年三月第一次印刷  
號 ISBN 978-7-5475-0348-5/H · 005

定 價 八十圓

本書如有印刷、裝訂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調換 (021-59110737)

# 林義光及其《文源》

劉釗 葉玉英

傳統「說文學」之所以舉步維艱，很難有所突破，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有二：一是宗許思想太重，始終難逃許說的束縛；二是未能有效地利用古文字材料，特別是在清代金文材料已經相當豐富的情況下，仍未能意識到金文對古文字研究的意義。由於受這些因素的局限，傳統「說文學」家之六書研究日臻繁複，文字說解卻很多都迂曲難通，字源學也被局限於對《說文》部首的研究。二十世紀初，在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等學者的帶動下，掀起了甲骨文、金文研究的熱潮，真正意義上的古文字學纔逐漸形成。孫詒讓的偏旁分析等科學研究方法的提出，為新文字學開闢了廣闊的天地。林義光的《文源》就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誕生的。

## 一、林義光生平及主要著作

林義光，字藥園，福建閩縣人<sup>①</sup>，生年未詳。從他與楊樹達的書信來看，卒年當為一九三二年。楊樹達之孫楊逢彬先生整理出版的《積微居友朋書札》中有「林義光三通」。其中第三通寫於一九三二年六月四日。楊樹達附記說：「此去年林君來簡。不久林君以暴病謝世矣。惜哉！」<sup>②</sup>據《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鑑》記載：林義光卒業於當時的外交部譯學館，先後在清華學校任國文教員，在北平中國大學、師範大學任講師。<sup>③</sup>徐文鏡《古籀彙編序》稱：閩侯林藥園與鄒安、方若、容庚、商承祚等人都是清末民初從事古籀研究的名家。范毓周《甲骨文研究的歷史、現狀與未來展望》也稱在一九二八年殷墟發掘以前，林義光是當時包括羅

振玉、王國維、葉玉森、陳邦懷、余永梁、王襄、陳邦福、商承祚、容庚等最早研究甲骨文的五十幾個人中的一個。在唐蘭、葉玉森、陳邦懷等人的有關甲骨文考釋的文章中也常常可見他們對林義光之說的評價。據胡厚宣《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記載，林氏除了《文源》外，還有《鬼方黎國並見卜辭說》、《釋裁蓄》、《卜辭心說即熒惑說》、《論殷人祖妣之稱》等四篇有關甲骨文字研究的文章，分別刊登在北平中國大學《國學叢編》一九三一年第一期第二、三、四冊，一九三二年第二期第一冊上。林義光不僅是古文字學家，還是當時著名的易學家、經學家。《清華學報》一九二八年第五卷第一期刊有一篇林義光的《周易卦名釋義》。當代易學名家黃壽祺曾以林義光為師。<sup>④</sup> 林義光還是當時著名的經學家。臺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經學文獻研究室於二〇〇七年啟動的「民國以來經學之研究」計劃書中指出：「此一時期的代表人物為羅振玉、章太炎、王國維、劉師培、林義光、鄭振鐸……」林義光在經學研究方面的著述於今可見的，除了刊登於《國學叢編》第一期的《三事大夫說》一篇以外，還有《詩經通解》一書，是其經學研究的代表作。林義光在音韻學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詣，《文源》附有他寫的一篇《古音略說》，提出了自己的上古聲母系統和古韻分部。

## 二、關於《文源》

《文源》一書寫定於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胡厚宣《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記載的《文源》為一九二〇年北平中國大學石印本，共十二卷，附二卷，四冊。不過，目前國內各圖書館如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山大學、福建師範大學、福建省圖書館等所藏均為林義光自印的石印本三冊。另外，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於一九八一年印有油印本二冊。

《文源》是一部運用金文以定文字本形、本義的字書，共收字頭一千五百五十一個，分為十二卷。書前

附林義光《叙》、《六書通義》、《古音略說》、《凡例》，書後附《通檢》、《引用彝器異名箋》。該書一改《說文解字》以小篆爲字頭之例，而以金文爲字頭（金文所無的字纔取小篆），以他的六書理論爲經，以他的古音理論爲緯，其目的是「觀爻象之變，掇采遺文，以定文字之本形，審六書，窺制作之源，以定文字之本義，然後古文可復，先聖述作之意曉然可知，文化之盛庶以不泯也」。林義光認爲小篆已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造字本旨，所以許慎「但就秦篆立說，而遂多不可通」（《叙》）。《文源》在體例上的重要特色表現在：

第一，以其六書理論爲綱，並貫穿每一條目。《文源》卷一爲「全體象形」，卷二「連延象形」，卷三「分理象形」，卷四、五「表象象形」，卷六「殼列象形」，卷七「表象指事」，卷八「殼列指事」，卷九「形變指事」，卷十「會意」，卷十一「轉注兼形聲」，卷十二「二重形聲」。在每一條目下都詳細分析字形，說明六書造字之意。

第二，以古文字字形爲字頭。在每一條目下都加按語「古作……」，所引古文字字形皆爲金文，因此《文源》成爲第一部系統運用古文字糾正《說文》的字書。比較系統地利用古文字來匡正《說文》，始於清末吳大澂的《說文古籀補》，其後經丁佛言《說文古籀補補》、強運開《說文古籀三補》不斷踵事增華。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等人在考釋甲骨文時也指出一些《說文》之誤，但像《文源》這樣系統地利用古文字分析研究《說文》的尚屬首例。林義光在總結古文字構形規律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六書理論，又反過來用這一理論統攝一千多個古文字，系統地分析它們的形音義，探求文字之源，所以他把這本書命名爲《文源》。當代古文字學者詹鄞鑫先生對此書作了很高的評價，他說：「（《文源》）用甲骨<sup>⑤</sup>金文兼取篆文以定文字之本形，審六書，窺造字之源，以求文字之本義。此書頗有見識，爲傳統『說文學』開闢了道路。」<sup>⑥</sup>

第三，《文源》在每一個字頭下首先注明該字所屬古音韻部。有時采用直音的注音方法說「音某」。有

的既有韻部，又言「音某」，還有反切。如卷一「母」字條下：「之韻，彌以切，又模韻，音母。」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林義光常常以音為線索，分析文字的構形和演變。因體例如此，故《文源》的每一條目下，作者一方面審定六書，一方面對文字的形音義加以考證。在作者選取的所有字頭中，大多數是作者在形音義上糾正《說文》的說解，對於作者與《說文》看法一致的，則儘可能補充古文字字形，使讀者對文字之源一目了然。

### 三、林義光的文字學思想

林義光是新文字學誕生後提出自己的六書理論並把它貫徹到具體的文字說解中且較為成功的第一人。他敢於跳出《說文》的藩籬而通過出土古文字資料來研究文字的形音義，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他在研究思路、古文字材料的運用、考釋方法以及六書研究等方面都為傳統「說文學」開闢了新的道路。

#### (一) 從古文字實際出發、不迷信的求實精神

林義光在《六書通義》中列舉了《說文》「不合文字嬗降之塗，與六書相刺謬」的一些錯誤之後說：「雖在前哲，不能曲為之諱也。」在當時的學術背景下，敢於說出這樣的話，需要極大的勇氣。因為在他所處的時代，宗許之風還很興盛，「凡許說所未安，必準之於理反之於心以求其是，或可以曲曲求通，雖別為之解亦不能遽信者，則不復巧創異說以取紛呶。蓋許書歷世傳習，久為學者所宗，非不得已，不敢奮其私脰」（《六書通義》）。從《文源》和《六書通義》來看，他基本上已擺脫了《說文》的藩籬，做到從古文字實際出發來研究《說文》、考釋古文字，這無疑促進了古文字學的發展。

#### (二) 科學的文字符號觀

首先他對語言與文字的關係有着正確的認識，他在《六書通義》中闡述了他的語言文字觀：「智者創

物，巧者述之。倉頡知以書契更結繩，而宇宙事物，必非倉頡書契所得賅，有不備者，隨事遞增，新字之作，至今猶未絕也。蓋文字者以濟語言之窮，故作新字必使其意不待說而明，由是六書生焉。六書者使字義傳於字形，不待口舌辭說，而行於異地異世者也。」可見他已經認識到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系統，它使語言除了說和聽以外又增加了一種寫和看的形式，從而使語言能打破時空的限制。由於事物是不斷發展變化的，所以新字也「隨事遞增」，源源不斷。人們創造文字是為了增強語言的交際能力，因此所造的字首先必須一看就能明瞭。六書就是人們為了使文字儘可能更好地表情達意而使用的造字和用字之法。其次，對漢字形音義的關係，對「音」在文字產生、構成、演變中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認識。林義光古音學修養相當精深，撰有《古音略說》。他特別重視音在文字產生和發展演變中的作用，把古音作為古文字研究的鑰匙，因此在很多問題上都能有所突破。如同字分化是文字發展演變的一個重要現象，原字與從其分化出來的字之間不僅在字形上有某種聯繫，而且在字音上往往也關係密切，所以林義光在確定幾個字形具有同字分化關係時常常從音的聯繫上尋找線索，並獲得成功。再如，林義光指出某些以往認為是象形、指事或會意的字實際上是形聲字或含有音的成分，如「寺」，手之所爲持也，之亦聲；「甸」，从人田，田亦聲；「便」，从人更聲，等等。這都是林義光在科學的語言文字觀的指導下取得的重要發現。

### (三) 歷史的、動態的文字發展觀

用歷史的眼光觀察文字的演變軌跡，在今天的學者看來已經是基本常識，但對於林義光所處的時代來說，能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有遠見卓識。在古文字研究實踐中，林義光總是以歷史的、動態的文字發展觀為指導。他十分注意分析同一字各字形之間的關係。古文字在形體上的大特點就是缺乏規範，同一個字往往有很多寫法，繁簡不一，甚至形體中的某些成分有可能祇起文飾作用，與文字的音義無關。林義光非常重視分析這些文字現象，常常指出「某是某的繁文」，「某是某的省文」，「省……」、「變作……」等等。文字

在演變過程中出現的各種變化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帶有一定的普遍性、規律性。林義光很善於在不同文字的形體變化中找到一些同類現象。他還特別重視探究幾個不同的字之間的同源分化關係，如「聲」、「聽」和「聖」，「史」、「事」和「吏」等。他研究六書，也是以動態的歷史的文字發展觀為指導的，所以能在六書理論如指事、形聲、轉注、假借等問題上取得突破性進展。

#### (四) 科學的文字考釋方法

唐蘭在《古文字學導論》（一九三四年出版，比《文源》晚十四年）中總結的幾種文字考釋方法如對照法、推勘法、偏旁分析法、歷史考證法，林義光早已運用自如。（甲）對照法。即各種古文字互相比較，用的最多的是把所要考釋的古文字與小篆進行對比，有時還可用隸書來與之相比照。這種方法宋代金石家就已經開始用了，到了清末已相當成熟。林義光也承用了這種對照法並解釋了不少字。如林義光根據「春」字篆作「喬」，象兩手持杵形，釋出「↑」、「●」即杵之古文，證明《說文》的解釋是錯誤的。（乙）推勘法。即根據典籍中的成語或辭例來推演。推勘法和對照法都是最常用的考釋方法，但各有其局限。對照法是據形識字，但容易使人望形生義；推勘法是據義以求字，但常常會犯望文生訓的毛病。究其根源，就是沒有處理好文字與語言的關係。要正確地考釋文字，就必須同時兼顧形、音、義。林義光不僅嫻熟地利用《詩經》《尚書》《易》《爾雅》等古代典籍，還充分利用清代古音學的成果，實現了形、音、義的互相推求。（丙）二重證據法。乾嘉之後，在王筠等人的帶動下，學術思潮和風氣發生了變化，金文研究逐步走向傳世典籍與出土文獻並重、經史與金文互證的道路。王國維等人就是在此基礎上加以發展，廣泛地應用於金文和甲骨文的研究之中，於一九二五年將其作為一種研究方法正式提出的。林義光在《文源》中也經常采用這種方法。（丁）偏旁分析法。林義光十分注意從同一偏旁的一組字中找出規律。如他認為《說文》解釋「卩」為符節是錯誤的，認為「卩」與人同字，從而成功地解釋了「令」、「命」、「印」、「辟」、

「卸」、「厄」、「邑」、「剗」、「邵」、「絕」等字。（戊）歷史考證法。即從文字產生和演變的角度加以考證，這種方法在當時尚處於摸索階段。林義光非常重視考察文字的演變過程，他一一考證了六十餘組原來「同字」而後來分化的字各自的演變過程及原因，其中很大一部分結論是正確的，如「夫」與「大」，「教」與「學」，「事」、「史」與「吏」，「玄」與「么」，「少」與「小」，「氏」與「氐」，「月」與「夕」，「舍」與「餘」，「佃」與「甸」等。（己）利用異文辨文字源流、訓釋本義。

#### 四、林義光古文字研究的主要成績

林義光的古文字研究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利用金文印證《說文》，一是從金文材料中摸索古文字形音義演變的規律。從古文字材料出發是林義光之所以能超越傳統「說文學」的根本原因。李學勤先生指出：「現代的古文字學之所以超過傳統的『說文學』，主要在於根據出土的古文字材料。」<sup>⑦</sup>甲骨文未出之前，由於未見「真古文」或佔有的古文字材料不足，包括許慎在內的歷代學者，在探索漢字源流及其發展演變規律的過程中，都難免受到局限。清代乾嘉時期以後，特別是清末甲骨文發現以來，不少學者根據《說文》釋讀古文字，同時也利用古文字印證《說文》，已經取得很大的成績。林義光直接繼承了吳大澂、孫詒讓等人的研究路子，利用古文字材料印證《說文》。與前人相比，應該說他在許多方面顯得更為成熟，如在思想上，比較徹底地擺脫了《說文》的束縛；在考釋方法上更具科學性、更成熟、更豐富；在理論上，對語言與文字的關係、漢字形音義的結合、古文字形體演變規律等方面認識更為準確。林義光利用古文字印證並糾正《說文》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文源》在文字考釋方面也頗多精當之處。近年來古文字學界有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即使是在古文字材料如此豐富、古文字學如此發達的今天來看《文源》的說解，其中仍有不少見解值得稱奇讚賞。丁福保編的《說文解字詁林》、周法高主編的《金文詁林》、李孝定編的《甲骨文字集

釋》、于省吾撰的《甲骨文字詁林》等最有影響的古文字集釋類專著都收錄了《文源》一些條目（特別是《金文詁林》引用了《文源》的大部分條目，並把它們列在每個字頭的最前面）。其他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的《中國古文字大系——甲骨文獻集成》也收錄了《文源》，李圃《甲骨文選注》、湯可敬《說文解字今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等也肯定了《文源》的一些說解。《漢語大字典》中徵引《文源》中的說解達八十五條。據不完全統計，自一九九四年至今，大陸及臺灣地區期刊登載的文章中引用《文源》的超過兩百篇。

前面說過，林義光有着動態的文字發展觀，他研究古文字時，一方面能從靜態的橫向的對比中找出文字演變的一些規律，如對一些偏旁的形近義通現象，《文源》總結不少此類條例，如「从支與从又同意」、「从寸之字古多从又」、「从父之字與又、支同意」、「古从言从音多通用」、「从戌猶从戈」、「从尸之字與从人同義」等。另一方面，林義光在《文源》中還特別重視文字縱向的歷史的變遷，從而注意到一些文字現象，提出許多新的課題如古今字、同字分化、訛變、異體字、形借、聲借等。

### (一) 古今字

早在西漢，當時的經學大師就已注意到古今字的問題，但一直到清代，古今字纔得以深入的研究並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如王筠提出了「分別文」、「累增字」的概念，徐灝明確指出「古今字具有造字相承的關係」。自古今字這一術語提出以來的近二千年的時間裏，歷代文字訓詁學家對它的理解不盡相同，有的認為古今字包括通假字；有的認為包括異體字；有的認為包括同源字。現代研究表明，古今字不同於通假字、異體字，也不完全等同於同源字，是一種客觀存在的文字現象。洪成玉先生概括了古今字的三個特點：（一）古字和今字有着造字相承的關係（少數古今字形體迥異），兩者是歷時的關係；（二）在語音上都是相同或相近；（三）在意義上都有這樣那樣的聯繫。簡而言之，古今字是指同一個詞在古今有着不同的寫法。<sup>⑧</sup>

《文源》中論及古今字一百四十餘條，所用的術語主要有「某之古文」、「即（當爲）某之古文」、「古作某」、「今字以某爲之」、「後出字」、「經傳以某爲之」、「某之本字」、「同字」等。從字形上看，主要是初文與後起字的關係，大部分是在初文上添加偏旁形成後起字，字形上有相承關係，如凶—胸、爰—援、孚—俘等；有的今字則是借用他字，所以字形多不相干，如𦇣—戾、𩫑—鮮等。從字義上看，今字多是爲了分化本義（《文源》一書旨在探求文字本形本義，所以並不是說林義光認爲古今字僅僅是爲了分化本義）。從音上說，古字與今字同音。林義光證明某字是某字的古文或本字時很重視它們的同音關係，如他認爲「季」爲「稚」（穉）的古文，他分析道：「禾爲稚省不顯。《說文》云稚亦聲，是季與稚同音，當爲穉之古文。」在今天看來，林義光對古今字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確的。

## （二）同字分化

同字分化是指由同一個字分化出兩個以上不同的字，這是文字發展演變過程中的又一個重要規律。同字分化現象與古今字可謂同中有異。它們都是文字爲了適應語言的孳乳發展而採取的必要手段，目的都是爲了更加精確地記錄語言，也因此，它們都是以詞的分化爲前提的。它們的不同之處在於：同字分化所分化出來的幾個不同的字記錄着語言中不同的詞，而古今字則是針對語言中同一個詞在不同的時代用字上的不同而言的。如果分化出來的字中有一個仍采用原來的字形，則同時兼有古今字的特點，如一些施受同詞的字像「受」與「授」、「買」與「賣」之類。由於分化出來的兩個字實際上分別記錄着語言中的兩個不同的詞，所以從這一角度來說不能稱之爲古今字，但「受」在古代兼有「授」義，「買」兼有「賣」義，從這一點來看，「受」與「授」、「買」與「賣」又構成了古今字。《文源》中「同字」這一術語實際上涉及三種情況：其一，多指同字分化，如夫—大、小—少、命—令、東—東、元—兀、不—丕、苟—敬等，約六十餘條目；其二是指一些本爲一字的反文、省變或異體而許慎分而爲二字的現象；其三則是爲了強調《說文》中的

一些字實際上是古今字，如萬——𧈧、祦——筭、番——采等。從這一點來看，似乎林義光對古今字和同字分化的界限混而不分，但我們認為這祇是術語上的偶然混用，林義光對文字演變過程中同字分化現象及古今字的認識已相當成熟，這可以從他的歷史的動態的文字發展觀得到證明。

### (三) 訛變

古文字學界把訛變現象作為一個重要的文字構形理論來討論始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在此之前，古文字學家雖然在考釋古文字的過程中也接觸到這個問題，但訛變現象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林義光是在他同時代的學者中較早重視這一問題的人。他研究訛變是把文字置於文字發展的歷史長河中進行的，認為金文、小篆和隸書中都存在訛變現象，指出訛變主要是由於一些構字部件形近而造成人們的誤用。在《文源》中談及訛變問題的條目有近百條，其中直接稱之為「訛變」者有六十餘條，其他術語有「某之變」、「某之變體」、「某之變形」、「變作某」等。在具體的字形分析中，他揭示了一些因訛變而造成的部首混同現象，如「人」（人形）、「木」（柶形）、「鳥」（鳥足形）均訛从「匕」；从寸之字古多从「又」；从口之字古多變从「甘」；从白之字多从「口」；由止訛為「中」；變「口」為「口」；古从辛之字或訛从「言」；从貝之字與从鼎之字多相混；从匚之字古作「从人」，等等。

林義光的訛變研究相當重要，這表現在：首先，他第一次提出了「訛變」這個術語，並把它作為文字發展演變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現象加以研究；第二，他指出了「形近而訛」是訛變產生的主要原因；第三，他總結了一些關於古文字訛變的條例並揭示了大量的古文字訛變的事實；第四，為他正確地考釋文字掃清了一些障礙。由於他關於訛變的觀點散見於一些具體的文字說解中，所以，還談不上構築系統的理論。但在他所處的時代來說，這些工作已經很了不起了。

## 五、林義光對傳統六書理論的重大突破

林義光的「六書理論」的根本點在於：六書乃造字之本。因此，他十分重視語言孳乳與文字產生發展的關係。他研究文字，既把一個個文字置於文字產生、發展和演變的歷史長河中加以動態的考察，同時又能注意靜態的文字結構的分析。通過對一千多個文字歷時的動態的考察和共時的靜態的分析，他對先民的造字本旨的認識應該說是深刻的。他認為「象形」之旨在於「形」；「指事」、「會意」之要在於「意」，「指事」與「會意」的區別在於指事字中往往有象形的成分，而組成「會意」字的各個構件均表抽象義；「形聲」、「轉注」、「假借」都與文字的孳乳分化密切相關。他認為「假借」造字法很早就出現了，它的主要特點是描摹語詞的聲音，是不造字的造字。「轉注」之要在於取同類之義附注其形，其主要功能在於分化文字。「形聲」造字法就是以表示同類事物的文字為意符並加上聲符。他認為形聲造字法最簡易，所以後出之字多為形聲字。所以說，假借、轉注、形聲都是文字為了適應語言的發展而採取的必要手段。林義光的這些見解在今天看來都還相當精彩。他在六書理論上最重要的突破是第一次提出形變指事和二重形聲的概念。

形變指事字是由已有的文字改變字形方向或增減筆劃後形成的，它是對原字的改造。從文字形體上說，形變指事字具有獨立的形音義，已分化為一個新字。這跟古文字中常見的正反、正側、正倒無別的一字異體有質的區別。許慎就是因為沒有認識到這一質的差別，所以他常把一些字的正反異體分為二字。如「止」和「少」、「少」與「少」本無別，許慎卻把它們析為二字。清代學者王筠、孫詒讓及近現代古文字學家羅振玉、王國維、唐蘭等人雖已認識到古文字形體往往正反、正側、正倒無別這一規律，但他們都沒有注意到兩類「反文」的區別，也不能在理論上給這些無法用傳統六書來分析的字予以歸類。林義光首創「形變指事」這一條例，從造字法的角度明確了「片」、「𠙴」、「𠂇」、「𠂇」、「𠂇」、「𠂇」等字的字形來源，從理論上解釋了這一文字發生、發展過程中的客觀存在的現象，所以說林義光在這方面有開創之

功。可惜，在林義光之後的半個多世紀裏，很少有人重視他在六書理論上的這一突破。直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裘錫圭先生再一次注意到這個問題，並提出了「變體字」這一概念，「變體字」屬裘先生「三書說」的表意字。他認為這類字是用改變某一個字的字形的方法來表意的，改變字形的方法主要有兩種，即增減筆劃（一般是減筆劃）和改變方向。<sup>⑨</sup> 詹鄞鑫先生擴大了裘先生「變體字」的範圍，把裘先生認為「不能納入三書」的「變體表音字」和「半記號字」也界定為「變體字」，並分成三類：A 取形變體字；B 取義變體字；C 取音變體字。<sup>⑩</sup> 裘、詹二先生所說的「變體字」與林義光指出的「形變指事」很接近，這證明了林義光「形變指事」一說是有價值的發現。

林義光所謂的「二重形聲」是指音同或音近的兩個偏旁組成的字。這種雙聲符字在甲骨文、金文和戰國文字中都是客觀存在的。宋代鄭樵就曾指出，並稱之為「母子同聲」，可惜無人回應，以至於一些構形特殊、無法納入六書的漢字長期被視為形聲字。林義光通過研究金文，再一次揭示了古文字發展中的這一重要規律，功不可沒。陳偉武先生在《雙聲符字綜論》中說：「林義光能够揭示漢字中雙聲符字的許多事實，正因為他打破了許慎的六書條例，糾正許慎誤聲為形的種種錯誤，還雙聲符字以本來面目。」<sup>⑪</sup> 在《文源》中，林義光指出了二十四個純雙聲符字，其中大部分已被證明是正確的。

綜上所述，可見林義光的《文源》在許多方面都具有科學性和預見性，對我們研究古文字、六書理論都有很好的指導意義，其學術價值不可低估。在學術史上應該給予林義光以相當的地位，對其學術研究所達到的高度，應當給予公允的評價。

## 注釋：

① 林義光在《文源》中署名「民國九年九月閩縣林義光」。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閩縣、侯官兩縣合併，取兩縣原名首字組成新的縣名「閩侯」。

② 楊逢彬：《積微居友朋書札》，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二十五頁。

③ 《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鑑》一書由北京大學圖書館馬月華女士提供，謹在此表示感謝。

④ 參看張善文先生博文《易學宗師之風範——先師黃壽祺教授治〈易〉成就述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0111340100ceql.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0111340100ceql.html)。

⑤ 《文源》未用甲骨，此說不够準確。

⑥ 詹鄞鑫：《漢字說略》，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十七頁。

⑦ 李學勤：《失落的文明·〈說文解字〉》，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七十七頁。

⑧ 洪成玉：《古今字》，北京：語文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⑨ 裴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八年，第一百三十九頁。

⑩ 詹鄞鑫：《漢字說略》，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二百一十五—二百一十六頁。

⑪ 陳偉武：《雙聲符字綜論》，載《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三百三十四頁。

# 目錄

導論 林義光及其《文源》

一

文源

一

叙

一

目錄

一

六書通義

七

古音略說

一九

凡例

三九

卷一

四三

全體象形

一二五

卷二

九七

連延象形

一

卷三

三

分理象形

一